

皓首学术随笔



季羨林卷

季羨林

任继愈

何怀宏

费孝通

吴冠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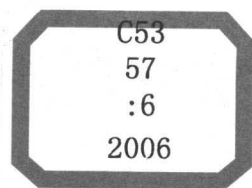
吴小如

朱新夏

戴逸

Ji Xianlin
Juan

中华书局



皓首学术随笔

季羨林卷

季羨林

袁宏

吴小如

任继愈

吴冠中

朱新厚

何怀子

戴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皓首学术随笔.季羨林卷/季羨林著.-北京:中华书局,2006

ISBN 7-101-05190-1

I.皓… II.季… III.社会科学-文集 IV.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8620 号

书 名 皓首学术随笔·季羨林卷

著 者 季羨林

责任编辑 张彩梅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8 $\frac{3}{4}$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5190-1/K·2304

定 价 30.00 元



老袁林

祝《文史知识》出版200期

李燕林

“文史知识”是我^最读的学术刊物之一。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，这种风格我想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：严谨而又清新活泼，学术性强而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。这种风格来之不易，是《文史知识》全体同仁经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形成的。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这样的刊物是必不可少的。

祝《文史知识》永葆青春！

1997.11.14

我的学术总结	/1
我与东方文化研究	/35
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	/39
《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》自序	/46
《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》自序	/55
《季羨林序跋选》序	/58
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	/62
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	/70
回忆陈寅恪先生	/76
记张岱年先生	/86
还胡适以本来面目	/88
《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》序	/108
《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》序	/113
中国人对音译梵字的解释	/116
语言学与历史学	/117
历史研究断想	/122
中国古史应当重写	/125
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	/127
国学漫谈	/131

- 《归义军史研究》序 /135
- 《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》序 /138
- 《中外关系史译丛》前言 /141
-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
——读《丝绸之路》札记 /143
- 锦上添花
——《国外文学》代发刊词 /153
- 《中外文学书目答问》序 /160
- 《文化意识的觉醒》序 /162
- 《国外中国学研究》前言 /166
- 《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》后记 /169
- 《罗摩衍那选》序 /172
- 从历史上看中德文化关系 /175
-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
——从西域文化的传入谈起 /181
-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之获得者高尔斯华绥 /188
- 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 /197
- 《歌德与中国》序 /203
-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/205
-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/211
- 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/216
-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/226
- 夜会(书评) /229
- 漫话历史题材 /232
- 我和书 /236
-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/238
- 推荐十种书 /240
- 我的书斋 /243
- 论博士 /245

论教授 /247

漫谈散文 /249

论新体旧诗 /255

语言混乱数例 /257

为考证辩诬 /259

再谈考证 /261

他们把美学从太虚幻境拉到了地面上 /263

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想

——为老友王元化教授八秩华诞寿 /265

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/268

文学批评无用论 /276

《人生箴言》序 /278

《海外中国学家译文丛书》序 /280

漫谈古书今译 /284

谈翻译 /286

翻译的危机 /291

我的学术总结

我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的，一直把《学术回忆录》写到今天。但是，事与愿违，近半年来，屡次闹病，先是耳朵，后是眼睛，最后是牙，至今未息。耄耋之人，闹点不致命的小病，本来是人生常事，我向不惊慌。但却不能不影响我的写作，进度被拖了下来，不能如期完成。“期”者，指敏泽先生给我定下的期限：1997年年底。其他诸位写同样题目的老先生，据说都有成稿，至少都有“成竹”，只有我另起炉灶。我不愿拖大家的后腿，偏偏运交华盖，考虑再三，只好先写到1993年了。

另外还有一个原因。我性与人殊，越是年纪大，脑筋好像越好用，于是笔耕也就越勤。有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说，季羨林写文章比他读得还快。这当然有点溢美地夸大。实际上，他读到的所谓“文章”都是我的余兴，真正用力最勤的《学术回忆录》，除了我自己以外，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人读到。我不是在这里“老王卖瓜”，我只想说明，从1993年到1997年这4年中我用中外文写成的专著、论文、杂文、序、抒情散文等等，其量颇为可观，至少超过过去的10年或更多时间。

总之，我不过想说明，无论从身体状况上来看，还是从写作难度上来看，甚至从时间限制上来看，我只能暂时写到眼前的程度，暂时写到1993年，剩下的几年，只有俟诸异日了。

说句老实话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写什么《学术回忆录》。但是，敏泽先生一提出他的建议，我立即一惊，惊他的卓见。继则一喜，喜他垂青于我。我不敢用“实获我心”一类的说法，正因在我心里原本是茫然，懵然，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最后是“一拍即合”，没有费吹灰之力，立即答应下来。

我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里“混”。这是通俗的说法。用文雅而又

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,则是“谋生”。这也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,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,也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回忆过去 60 年的学术生涯,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。迷惑与信心并举,勤奋与机遇同存。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,对有志于学的青年们,估计不会没有用处的。这就是“一拍即合”的根本原因。

紧跟着来的就是“怎样写”的问题。对过去 60 年学术生涯的回忆,像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蜘蛛网,把我的脑袋塞得满满的,一时间很难清理出一个头绪来。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,根据自己现在回忆所及,把过去走过的学术道路粗线条地回顾一下,整理出几条纲来,略加申述,即可交卷。这样做并不难,我虽已至望九之年,但脑筋还是“难得糊涂”的。回忆时决不会阴差阳错,张冠李戴。但是,我又感到这样潦草从事,对不起过去 60 年的酸甜苦辣。于是决意放弃这个想法。

经过了反复思考,我终于想出了现在的办法。这样做,确实很费精力。自己写过的许多文章,有的忘得一干二净,视若路人。我在这里不能由衷地感谢李铮、令恪、钱文忠等先生细致详尽地编纂了我的著译目录。特别是李铮先生,他几十年如一日,细心整理我的译著。没有这几位朋友的帮助,我这一部《学术回忆录》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。

我现在就根据他们提供的目录,联系我自己的回忆,把我过去 60 年所走过的道路描画出几条轨迹来,也把本书之所以这样写的理由写了出来。下面分项加以解释。

一 本书的写法

关于本书的写法,经过考虑,我采用了以著作为纲的写法。因为,不管在不同时期自己想法怎样,自己的研究重点怎样,重点是怎样转移的,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,最终必然都表现在自己写的文章上。只要抓住文章这一条纲,则提纲而挈领,纲举而目张,其他问题皆可迎刃而解了。

二 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

特点只有一个字,这就是:杂。我认为,对“杂”或者“杂家”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,不能笼统一概而论。从宏观上来看,有两种“杂”:一种是杂中有重点,一种是没有重点,一路杂下去,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。

先谈第一种。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,在学问家中,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。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,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、文艺复兴时期的达·芬奇,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。他们是门门通,门门精。藐予小子,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,除非是我发了疯,神经不正常。我自己是杂而不精,门门通,门门松。所以聊以自慰者只是,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。所谓重点,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、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。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,为了换一换脑筋,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。间有所获,也写成了文章。

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“由博返约”的说法。我觉得,这一个“博”与“约”是只限制在同一研究范围以内的。“博”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把基础打得宽广一点,而且是越宽广越好。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,专门研究一个或几个课题。由于眼界开阔,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。我个人的研究同这个有点类似之处,但是我并不限制在同一领域内。所以我不能属于由博返约派。有人用金字塔来表示博与约的关系。笼统地说,我没有这样的金字塔,只在我研究的重点领域中略有相似之处而已。

三 我的研究范围

既然讲到杂,就必须指出究竟杂到什么程度,否则头绪纷繁,怎一个“杂”字了得!

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,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:

1. 印度古代语言,特别是佛教梵文
2. 吐火罗文
3. 印度古代文学
4. 印度佛教史
5. 中国佛教史
6. 中亚佛教史
7. 糖史
8. 中印文化交流史
9. 中外文化交流史
10. 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
11. 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
12. 德国及西方文学
13. 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
14. 散文及杂文创作

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。

四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

——由考证到兼顾义理

清儒分学问为三门:义理、辞章、考据。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,但这很难。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,但是,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,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。就我个人而言,也许是由于天性的缘故,我最不喜欢义理,用现在的说法或者可以称为哲学。哲学家讲的道理恍兮惚兮,以我愚钝,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象。哲学家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天底下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样的。我喜欢实打实、摸得着、看得见的东西。这是我的禀赋所决定的,难以改变。所以,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,亦称考据。考据,严格说来,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,其精髓就是,无证不信,“拿证据来”,不容你胡思乱想,毫无根据。在中国学术史上,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,当时大师辈出,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

读的古书,这是它最大的贡献。

在德国,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,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,其目的在拿出证据,追求真实——我故意不用“真理”二字,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,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。德国学术以其“彻底性”(Gründlichkeit)蜚声世界。这与他们的民族性不无联系。

至于我自己,由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师承关系,又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个人禀性的缘故,我在学术探讨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影响。在中国,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。在德国,我的老师 Prof. Sieg 和 Prof. Waldschmidt 和后来的老师 Prof. H. Lüders,也都是考证巨匠。因此,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,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。即使我再狂妄,我也不敢说,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。在我眼中,以上这几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。

可是,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,到了晚年,“老年忽发少年狂”,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,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。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。

五 我的义理

我在我一生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讲到我不喜欢义理,不擅长义理。但是,我喜欢胡思乱想,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。我觉得,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,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,钻得太透,或者也可以说,钻得过深,钻得过透,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,临深履薄,战战兢兢,有如一个细菌学家,在他眼中,到处是细菌,反而这不敢吃,那不敢喝,窘态可掬。一个外行人,或者半外行人,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,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、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東西。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。我决不敢说,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,但是,我却相信,我的意思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。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,如果没有极少数不肯受钳制、不肯走老路、不肯固步自封的初

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,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。当然,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“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”、“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”。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,说对了了不得,说错了不得了。因此,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。如果心怀哗众取宠之意故作新奇可怪之论,连自己都不信,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?我幸而还没有染上这种恶习。

总之,我近几年来发了不少“怪论”,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,别人信不信由他,我不企图强加于人。我的怪论中最重要的是谈中西文化同异问题的。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,我处处发现中西文化是不同的。我的基本论点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:东综合而西分析。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。举其荦荦大者,比如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,西方对自然分析再分析,征服再征服。东方则主张“天人合一”,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: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”结果是由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科学技术,在辉煌了二三百年来,主宰了世界,为人类谋了很大的福利之后,到了今天,其弊端日益暴露,比如大气污染、臭氧层出洞、环境污染、淡水资源匮乏、生态平衡破坏、新疾病层出不穷,如此等等,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。这些弊端将近200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就曾预言过,如今不幸而言中。这些东西难道能同西方科技的发展分得开吗?

令人吃惊的是,到了今天,竟还有少数学者,怀抱“科学”的上方宝剑,时不时祭起了“科学”的法宝,说我的说法不“科学”,没有经过“科学”的分析。另外还有个别学者,张口“这是科学”,闭口“这是科学”,来反对中国的气功,甚至中国的医学、针灸、拔罐子等等传统医疗方法。把气功说得太神,我也不能接受。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,经过国内外多年的临床应用,证明这些方法确实有效,竟还有人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死抱住“科学”不放,岂不令人骇异吗?

其实,这些人的“科学”,不过是西方的主要在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。五四运动时,中国所要求的“赛先生”者就是。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,这位“赛先生”确实获得了一部分成功,获得了一些真理,这是不能否认的。但

是,通向真理的道路,并不限于这一条。东方的道路也同样能通向真理。这一个事实,刚才露出了端倪,还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,至于后事如何,21世纪便可见分晓。

六 一些具体的想法

同我在上一节谈到的“我的义理”有一些联系的是我的一些具体的想法,我希望这些想法能变为事实。

我在下面把我目前所想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想法加以简略的介绍:

1. 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

世界语言种类繁多,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“科学”的分类法。不过,无论如何,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,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。然而,在我国内,甚至在国外,对汉语的研究,在好多方面,则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无大差异。始作俑者恐怕是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。这一部书开创之功不可没,但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,这也是无法否认的。汉语只有单字,没有字母,没有任何形态变化,词性也难以确定,有时难免显得有点模糊。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,有人就想进行改革,不是文字改革,而是语言改革,鲁迅就是其中之一,胡适也可以算一个。到了现在,“语言改革”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。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,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。我个人认为,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。

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,但是,妙就妙在模糊上。试问世界上万事万物百分之百地彻底地绝对地清楚的有没有?西方新兴科学“模糊学”的出现,给世界学人——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家,还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家——一个观察世间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新的视角。这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是大有裨益的。

因此,我建议,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,改弦更张。

2. 中国通史必须重写

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,在世界民族之林中,最重视历史的民族是中华民族。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在长达几千年的时期内,我们都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文字记录,而且还不止有一种,最著名的是《二十四史》,这是举世闻名的。我们每一个朝代都有断代史。正史之外,还有杂史。至于通史这种体裁,古代我们也有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都有通史的性质。我们决不敢说,这些史籍所记录的全是事实,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,中华民族是一个颇为实事求是的,没有多少想入非非的不着边际的幻想的民族,却也是大家所公认的。

近代以来,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《中国通史》之类的著作。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,而观点则见仁见智,各不相同。这是很自然的事。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。建国以后,大事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。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。可惜的是,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是前苏联版的,带有斯大林的印记。在“一边倒”的影响下,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,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,都受到了感染。专以中国通史而论,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,异说纷纭,仅“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”这一个问题,就争论不休,意见差距超过千年,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,只好不了了之。我真怀疑,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。再如农民革命战争问题。史学家们窥伺上意,纷纷赞颂不休,说什么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。真是这样子吗?历史事实证明,农民战争即使是胜利了,也不过是以暴易暴,哪里谈到什么推动社会前进。如果不胜利,则不过破坏生产,破坏经济,使生民涂炭而已。假如一定要说它有进步意义,则只有肯定翦伯赞的“让步政策”的主张。唐太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:“民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可是这个主张被认作“修正主义”,议论者谈虎色变。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,语无伦次,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。鲁迅说,谩骂不是战斗。它决不能打倒佛教,更谈不到消灭。这样的例子,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,现在先到此为止吧。

在这样“极左”思想的指导下,颇写出了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《中国通史》,大中小学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。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,名气多么高,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,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,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,有时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。有人称之为“以论代史”,而不是“以论带史”。关键在于一个“论”字。这是什么样的“论”呢?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,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“论”,而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“论”。历史研究,贵在求真,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,削足适履,以求得适合他们的“论”。

另外还有一些情况,我们必须注意。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,一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广袤的问题。关于第一个问题,我们过去写通史,觉得最有把握的是,最早只写到商代,约公元前 17 世纪至 11 世纪,在《古史辨》派眼中,夏禹还只是一条虫,遑论唐虞,更谈不到三皇五帝。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 3000 多年,较之埃及、巴比伦,甚至印度,瞠乎后矣。硬说是 5000 年文明古国,不是硬吹牛吗?然而,近年来,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,夏代的存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,也给禹平了反,还他以人形。即以文字发展而论,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,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的历史。我们相信,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,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,换句话说,必将会更长。

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,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。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,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。有的人甚至主张,长江早于黄河。不管怎样,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。这只要看一看《楚辞》便可明白。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,《楚辞》这样水平高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。长江流域以外,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。这一切都说明,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,是不够的。今天我们再写历史,决不能再走这一条老路。

因此,我主张,《中国通史》必须重写。

3. 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

在 20 世纪以前,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